

席扬◎著

多维整合 与雅俗同构

——赵树理
和“山药蛋派”
新论

唐 扬 著

多维整合 与雅俗同构

——赵树理
和“山药蛋派”
新论

中国文联出版社

席扬◎著

多维整合 与雅俗同构

——赵树理
和“山药蛋派”
新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 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席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04-4582-2

I. 多… II. 席… III. 赵树理 (1906 ~ 1970)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0676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 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华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赵树理研究的新收获

黄修己

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简略地回顾赵树理研究历程的《不平坦的路》。在这部书的《自序》中我写道：“说来令人好笑，我这部书是‘倒着写’的。”这指的是我在动笔时，恰好读到了张颐武和席扬两位年轻人新发表的论文，他们都从评价农民文化的角度，对赵树理的创作作了新的审视，给人以新颖之感。于是我便从介绍他们二人的最新成果起笔，由近而远，倒着写回去。那时的张、席两位先生，大概都只有二十来岁，在文学批评界都还是新人。后来张先生向当代批评发展，现如今已是文学批评界的当红作家。席先生则在广泛涉猎的同时，仍然关注赵树理研究，不断有这方面的新成果问世。十几年后，便有了他的集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研究成果的这部著作。当初引起我注意的《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一文，也收在这里了。

我那时对文化问题那么感兴趣，是因为此前多少注意过作家研究的文化视角。1979年我写《赵树理评传》时，流行的是政治视角，人们还习惯于从政治价值上来评论作品的意义。我那时写了一节赵树理小说的“乡土风味”，就是想的政治之外寻找新角度。这一节还曾作为单篇评论，发表在《汾水》上。两年后写《赵树理研究》，便扩大为一章，即《赵树理创作和晋东南地理》。这多少也是受了泰纳（亦译为“丹纳”）的影响。我曾在北大课堂上讲过这个问题，发现学生们很感兴趣。后来知道，我做的就

是在 90 年代成为热点的“地域文化研究”。那时出的一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中，还有一部青年教授朱晓进的《三晋文化和山药蛋派》，比我当初那一章规模大多了，内容也增加了不少。这部书成为 90 年代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收获。

但我当初注意的只限于作品的地方特色，没有像席扬先生这样，明确地从农民文化，实际上是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分析赵树理的创作。这样的角度视野更开阔，创新点更多。不妨举些例子：

关于赵树理的文化身份的辨析，席扬认定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性”，就有别于前人的定位。以前我们只强调赵树理与农民的密切关系，有时称他为农民作家，但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一般有两种角色认定。一是“幕僚”的角色，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为统治者制造幻想。一是“批判者”的角色，站在社会之外或边缘，同样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批判现实，打破幻想。赵树理爱写“问题小说”，为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正属于这一类，无论 40 年代的，还是 50 年代的作品，这个特征都是很鲜明的。他也有角色焦虑，那是做第一种、还是做第二种知识分子的焦虑，他是有思想矛盾的。但他坚持“批判性”所表现的骨气，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性”的最可宝贵的特征，也是他至今为我们所钦佩的原因。我以前认为赵树理在社会上的境遇，是执政党与农民关系的反映，虽说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如从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来分析，也许能更充分、更深入地发现并说明问题。

又如，席扬提出“情趣”的命题，这可能是他对赵树理作品艺术感受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读赵树理建国前的小说，从《小二黑结婚》到《田寡妇看瓜》，不论主题的大小，也不论艺术成就的高低，都有其特有的“情趣”，这是形成赵树理小说审美特征的因素之一。但在建国后的作品中，这种他所特有的、惯有的“情趣”，在某些作品中失去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席扬提出

了“自由艺术理性”的概念，用以分析赵的“自由生成的审美选择机制”的形成、成熟，认为“赵树理的艺术趣味是在多重自由的民间文学土壤上生长起来的，由于这种兴趣的建立过程是一个纯自然过程，也就决定了他不仅接受了它的价值观念和创造方式，而且接纳了其自由意念并构成了赵树理自己在审美创造中的艺术理性和智慧”。（《面对现代的审察》）这就是赵的“情趣”形成的原因。而别人替他总结的“赵树理模式”，则给他带来了“不自由的限制”，使他失去了“情趣”。我觉得这不仅是对赵的创作深度分析，而且创造了“情趣”这一美学命题，具有理论的价值。

还可以举“山药蛋”派研究的例子。席扬从这一流派的艺术特征的分析，从逐一采访该流派主要成员所获得的感性认识中，总结了他们的文化特征和“山药蛋审美”特点；提出该流派是三种色彩的“解放区文化”的“最完美的结合与调剂”。所谓三种文化，即“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农民文化”。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山药蛋”派的认识，而且是对解放区文学的很有力的解释。

赵树理研究在50年代曾是“显学”，粉碎“四人帮”后为拨乱反正，恢复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它又一度兴起，形成热潮。这一阶段的成就在于使赵树理研究摆脱对政治的从属，踏上了学术化之路，并做了许多基本建设工作。但这一阶段的时间并不算长，席扬的研究就出现在这一阶段的末尾。90年代后，赵树理研究落入低潮，渐成冷门。赵树理是写农村的“圣手”、“铁笔”，他出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的高潮，那时不说他在文学上的重要创造，单是他所反映的农村变革的故事，就够引人关注的了。他受到重视，得到很高的评价，是理所当然的。到上世纪末，中国社会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关注点从农村移向城市，农村题材在创作中受冷落，对赵树理感兴趣的人也少了。这

是社会变动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赵树理的出现和得到高度评价，毕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不能遗漏的重要现象，还要有人来研究，所以他是不会被遗忘的。不过像热潮期那样许多人集中地研究，成批地出成果，大概很长时间里都不可能再现了。今后要像席扬这样，细水长流，积少成多，一筐一筐地挑土来聚成高山。现代作家在成为历史人物后，能够长时间里不被冷落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在不同时期还会有成为研究热点的人，如 80 年代的沈从文，90 年代的张爱玲等。什么时候什么作家成了研究热点，这不好预料，这是有社会的、学术的原因的。“五四”至今的现代文学，历史还很短，有大成就的作家也不能说很多。当学科初建时，须要把一个一个作家过细地剖析，那时有人就是长时间里只研究一个两个作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便不能再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个别作家的范围，今后专门研究赵树理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要在赵树理研究中取得突破，也越来越难了。好比跳高，经过努力，跳过了两米，取得显赫的成绩；但此后要破这个纪录，哪怕只提高一公分，便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这一公分可能需要日久天长的艰苦奋斗。再则，文化的建设，学术的建设，不可能总是轰轰烈烈地高歌猛进，需要的是经年累月的静悄悄地工作。这是文化建设、学术建设的常态和规律。席扬先生在崭露头角后，就转入了静悄悄的、扎扎实实地研究中，一点一滴地积累，取得了现在的成果。这些成果并不少于先行者们在热潮期中之所得，而且可以说更坚实。上面我举出本书一些创新的例子，来同我以前的成果相比，不是可以看出席扬在学术上的超越吗？

赵树理研究现在是冷下来了。这时，席扬用他的成果告诉人们，只要耐得住寂寞，只要能坚持不懈，这同样是学术上可以有大成就的时期。愿我们能够抓住这时期，埋头苦干，更大的收获正热情地向着我们招手呢！

目 录

赵树理研究的新收获.....	黄修己(1)
赵树理为何要“离京”“出走”.....	(1)
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	
——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	(24)
面对现代的审察	
——赵树理创作的一个侧视	(43)
“问题”文本与“话语”规约	
——赵树理建国前小说创作的“修辞行为”分析	(59)
盲视与洞见	
——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的“修辞行为”分析	(76)
“干部”“群众”的隐喻与功能	
——赵树理小说创作“修辞行为”散论	(91)
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	
——赵树理创作价值新论.....	(105)
农民,何曾“拒绝”过赵树理?	
——面对“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感言.....	(122)
赵树理不会写散文?	(135)
文化整合中的传统创化	
——试论“山药蛋派审美”在解放区及中国当代 文学中的意义.....	(140)

20 世纪“山药蛋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164)
“山药蛋派”的价值及其研究方法	(187)
试论“山药蛋派”的生成、演化过程	(204)
“山药蛋派”文化特征初论	(221)
“山药蛋派”艺术选择是非论	(231)
“文化”“文学”双重意识的直面渗透 ——评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247)
谢俊杰小说创作论 ——“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个案分析之一	(254)
附录一 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研究资料选目 (1943—2003)	(272)
附录二 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代表作家主要 作品辑目	(296)
后记	(299)

赵树理为何要“离京”“出走”

1965年2月22日，赵树理离开居住了16年的北京，携全家来到山西太原，住进南华门东四条省文联的平房四合院中，一直到1970年被迫害致死。我说赵树理是“来”而非“回”，那是因为太原并不是他的“老家”，只不过他的家乡隶属于山西，故而，赵树理“来到”太原，在一般人眼里就是“回”山西了。笔者研究赵树理多年，所接触的资料自然也不能说少，但赵树理为何要离开北京“出走”山西，却始终未能获得一种让我确信无疑的说法（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哪一篇文章是专门谈论这个问题的）。1965年的2月22日，正是农历蛇年的正月二十一。就北方习俗或北方人习惯，正月里过大年，“过”罢“二十”，这“年”才算真正“过”完了。赵树理选择这一天启程，应该说是蛮有意味的——一是说明，离京的“去意”是早已定了的，故此才有这样“从容”的安排；二是他实在是想和全家人一起在北京度过一个完完整整的“大年”。也许他早已意识到，能在北京属于自己的家里愉快地“喜迎新春”，今生今世怕只有这一次了吧——几多苍凉、几多悲慨早已在不言之中了。他对北京的留恋是深切的：16年当中，“荣”“辱”的置换，在他的身上体现的真是太富有戏剧性了！赵树理对“官”是轻看的，但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说说唱唱》主编、工人出版社社长等职务，与他来讲，又决不是一时间全然可以漠视的闲职虚位。虽然他在北京因“两个胡同”的彼此相轻而不免“孤

独”，但他毕竟是“大人物”，连那些很看不惯的人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且不说还有周扬这样的通天人物频频关注着他，下有如老舍类的“同气好友”也常常以极真诚的“钦佩”给他注入着不断的自信与傲然。^①对北京，他实在是该留恋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赵树理被批了几个月，但批判在“高潮”时分的戛然而止以及后来作协内部给他郑重其事的“平反”，倒不如说是为他的生涯平添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愉快。至于1962年的“大连会议”，几乎成了对他的“赞美大合唱”。此情此景已是让许多人“嫉妒”得受不了了——甚至有人在此事过了两年之后的1964年还愤愤不平地责问：“在现代文学史上，当面受到这么多作家的恭维、吹嘘，恐怕没有先例吧。”^②是的，仅此一点，赵树理就足以自豪一辈子了。周扬、邵荃麟等领导们对他的赞美几乎变成了“讴歌”。周扬说：“他对农村有自己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邵荃麟则表白得更真诚：“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起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的社会常常忽视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深刻。”^③这与其说是在针对个人，不如说是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一种颂扬。如果我们想一想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那日益恶化的文化处境，就知道赵树理的这种“坚持”显得多么的稀有、可贵！凡此种种，赵树理是没有理由非要离开北京不可。

① 可参见胡絮清《老舍与赵树理》，香港《文汇报》1980年10月8日。

②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③ 同上。

然而，他还是决定要走——何以如此呢？

有关的说法不但很多，而且歧异很大：

同是“山药蛋派”的马烽，解放初与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共事经年，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他的。马烽在《忆赵树理同志》一文中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前二年，（赵树理）为了深入生活的方便，干脆把家搬回了山西，从事农村的实际工作，他在好几个县担任过具体职务。”^① 王培民回忆说：“建国初期，赵树理曾有一段时间在北京专职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他住在北京，却想着乡下的春种秋收，农民们还未摆脱的贫困生活，常常使他寝食不安。为了和农民同甘共苦，为了能和农民一道耕作，一道生活，一道思考，他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山西。”^② 董大中先生在他的《赵树理年谱》中对这件事是这样叙述的：“全家离开北京，迁往太原。”^③ 在他的《赵树理评传》里他作了进一步的推论：“尽管在建国以后好多年赵树理每年都要回到晋东南跟他的老熟人们‘继续共事’，但毕竟不如把户口转到这里来比较方便。于是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赵树理离别了伟大首都北京，把全家迁回山西住在太原市南华门16号。”^④ 高捷等撰著的《赵树理传》谈到这件事时这样表述：“从12月20日到1965年的1月4日，他以山西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即调回山西省文联工作。”^⑤ 他的老同事沈彭年先生在1979年回忆说：“1958年大跃进时，他写信把房子交给了国家。后住和平里，又住大佛寺西街。1965年携全家返回山西太原。”^⑥

① 《光明日报》1978年10月15日。

② 《求实与献身——纪念赵树理逝世十周年》，《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

③ 《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05页。

④ 《赵树理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

⑤ 《赵树理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⑥ 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老作家王亚平认为他离开北京，是“晚年回乡深入生活，志在搞出几部文学巨著”。^① 赵树理的生前好友、原《工人日报》社长章容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曾问过他，为什么对先进人物的描写不够丰满？他说，没有找到。1965年初他把全家迁回山西，就是要深入生活，发掘先进人物，作新的探索。”^②赵树理的师范同学、老朋友王中青在评价他的创作时顺便谈道：“（他）可惜对新一代农民的精神状态的描绘还不够深透，晚年他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下决心回山西深入基层，竭力观察一代新型农民的成长，并构思了两部长篇《户》和《石头底》。”^③ 与赵树理一起在中国作协共事、在艺术上有共同追求的老作家康濯于1981年接受李士德采访时却提出了与上述说法相左的意见：“1964年作协贯彻‘两个批示’，头一个批了邵荃麟，批判了所谓‘中间人物论’，点了赵树理和我。赵树理在大连的会上说：‘刮五风，公社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好比旧社会农村妇女，想找个好丈夫，嫁个人家不怎么好，但也得活下去。’这类话，当然被视为攻击‘三面红旗’（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言论，遭到厄运。1965年初，所谓‘中间人物论’挨批之后，他被打发回山西，全家迁太原。”^④ 阿农先生在《大师的风度——怀念作家赵树理同志》一文中也表达了与康濯相似的观点。“是因为《火花》上的触犯圣灵的文章（此是指赵树理发表于《火花》1964年第2期的《‘起码’与‘高深’》一文——引者注）自然也还会有一些什么别的因由了，赵树理在‘文化大革命’前两年就被逐出北京，搬家到了太原。”^⑤ 严文井《赵树理

① 《赵树理的创作生活》，《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② 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钟山》1981年第1期。

在北京的胡同里》一文中这样说：“几经周折，老赵终于离开了北京的胡同，回到了山西的山沟沟里去了。”“北京东总布胡同46号的寓客当中有一个赵树理——一个真正的作家。”^①当时在山西省委领导身边工作的刘开基也认为，是因为“文革”前毛泽东连续针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下达后，赵树理又一次成为“整风”的重点。“赵树理首当其冲，而且离开生活过16年的首都，下放于晋城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②

赵树理自己是如何说的呢？现在唯一可以作为资料征引的、是他在“文革”初期检讨书《回忆历史，认识自己》里的一段话。他写道：“离京之后1、写英雄之计：我对创作上没有写出英雄来的错误虽说是早有察觉，却还数在北京整风时候（1964年后半年）认识得更为深刻，调到山西省文联来便打下了写英雄的决心。”但是我们可以悟出，赵树理在此谈的是到达山西之后的心态，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回到山西”的问题，他是跳过去并未涉及。许多人认为，赵树理一直是把山西视为自己的“根”之所在——纵观赵树理的一生，这种看法显然是无大错的。但他毕竟已在北京居住了16年——除了老家晋东南之外，这里无异于他的第二故乡。作为一个文化人，赵树理十分清楚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对于他的意义。这里不能不谈到赵树理一生都未能摆脱的精神矛盾：他多次说过，他毕竟是一个与农民不一样的知识分子。但他同时又常常有意无意地表露出他在农村天地里的“驾轻就熟”。1964年底，他对在北京学习的山西青年作家义夫直言：“如果让我当一个县里的农工部长，我一定能把全县的农业生产搞好。”^③1959年“反右倾”时，赵树理因“挨批”很苦闷，甚

① 《中国作家》1993年第6期。

② 《赵树理研究》2001年第12期。

③ 转引自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02页。

至对康濯说：“如果需要我去亚非拉人民中做点工作，我倒真想去去，热热闹闹干一干哩！”^①联系他在“文革”前“十七年”里的活动，我们确实看到他对于农村、基层的偏爱。五六十年代，赵树理总要挤出时间到基层农村住些日子。这些都在说明，赵树理自始至终都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位置上。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赵树理想干什么与他非要离开北京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居留北京16年里，赵树理的创作几乎全是面向农村的——这至少说明在北京并不妨碍他创作理想的完成与实现。虽然，他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一文中也谈到，早在50年代他就“对于作家应否专业化开始怀疑，以后便肯定了不应有专业化的想法，并请示过转业未被批准”。但“转业”并不等于“回山西”——即使后来“回”到山西，也并未实现其“转业”的理想。

实际上，赵树理的“离京出走”，是一个值得说清楚的、却又是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以上所征引的材料看，赵树理“离京出走”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方便“深入生活”说。返回到上面看，持这一说法的有马烽、王培民、董大中、王亚平、章容、王中青等。这些人中间，除了董大中之外，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与赵树理有着交情。这些人中如马烽、王中青、章容、王亚平等，多年来不仅从事着文艺的创作、批评，更重要的他们又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者。他们的革命生涯、艺术理念，他们对于艺术之于现实功利性的体认，他们对于一个作家进行评判时首先注重其“政治性身份”的偏好以及他们对于艺术创作与现实关系的有意

^① 《根深土厚——忆赵树理同志》，高捷编《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强调等，都不可能使他们把赵树理“离京出走”这一事件，看成是“私人事件”。加之他们在与赵树理长期“共事”过程中对他的了解与推想，不由自主地要突出赵树理这一行为的“神圣性”、“公共性”和“非个人性”意义。把赵树理“离京出走”的理由坐实在为了“深入生活”方面，既符合自1942年以来赵树理所赢得的历史辉煌，又切合时代理念对一个作家所有个人行为的阐释要求，同时也是他们外化自我价值信仰的一种方式。就这些“回忆文章”的整体来看，他们对于“君已无言”的赵树理的“言说”，痛惜、哀怜是其内容的情绪特征，竭力把赵树理以见证人的真实口吻描述成为一个“公共英雄”形象，是其“主题”用力所在。为此，淡化或对赵树理的“个人空间”、“精神私史”有意予以忽略，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不可更改或难以改变的话语结构与言说方式。另一方面，从另外一种角度思考他们的说法，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或许他们压根儿就不怎么知道赵树理“离京出走”的真正原因。据我们所知，1962年以后的赵树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连连厄运临头。1964年前后毛泽东“两个批示”下发后，中国作协对他“老账新账一起算”——所有在大连会议上“讴歌”过他的人，包括邵荃麟等领导在内，一一都触了霉头。1964年8、9月后，《文艺报》开始集中批判“中间人物”理论及其创作。同年1月份，赵树理在中国作协参与“整风”，对他真是触及到了“灵魂深处”。他对自己的不合“时宜”，“认识的更为深刻”。他已明显地感到，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1964年全年，赵树理在山西呆了不少时间——“4月中旬，应邀赴长治参观全区戏曲汇演”，直到8月底才返回北京。这四五个个月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在长治、晋城两地参观走访、排戏写作。但在这一年里，他在山西的麻烦也不少。1964年3月，山西省文联的机关刊物《火花》杂志，因发表赵